

网络言行 应遵循法律底线

“一个人挥舞胳膊的自由止于别人鼻子的地方。”这句名言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言行是有边界的。倘若每个人都以“自由”为名侵犯他人权利,自由便不复存在。

今天,“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网络空前拓展了表达空间,也让人们享受到了更多自由。但自由的合理边界在哪儿?应该有一个基本共识。

网络世界依然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网络发言,同样应该遵循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如果以“自由”之名诽谤、侮辱他人,损害别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这实质上是违法甚至犯罪;如果持着“正义”的理由,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搞所谓“谎言倒逼真相”,这同样是不负责任。

去年英国骚乱后,首相卡梅伦曾感慨:“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来做好事,但同样可以用来干坏事。”网络给了我们更多自由,也给了我们更大责任。确立责任边界,厘定“法”与“非法”的标准,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自由、保护权利,才能更好地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进步。 郭胜

从“丈母娘”的视角看教育

日前,一则关于素质教育的争论,在网络上引来诸多围观。这次的新角度是“丈母娘”。武汉一位小学校长撰文称,一位女老师拒绝了当年的“得意门生”当女婿的提议,认为这个年轻人虽然不错,但各方面“太古板”,“很难给女儿带来幸福”。这位校长反思:如果老师们都把自己当成“丈母娘”,把学生看做是未来的女儿女婿,是否还会以现在的方式进行教育?

以“丈母娘”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教育,虽是一句调侃的戏言,但仔细品味,不妨“严肃”视之。因为,很多时候老师并未真的把孩子当“人”来看——孩子的身份只是“学生”,而忘记了他们都是完整的人和鲜活的生命个体,由此带来的机械应试操练、单一的灌输等教育方式,让学生讨厌学习。而失去灵动和生机的教育,出现既古板而又优秀的学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丈母娘”视角看教育,或可提供一个还原教育“人性”的机会。不少老师认为,教育“以人为本”,是很难实现的高远口号。但如果真把学生还原成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人”、当成自己的女儿女婿,是否会更加全面关注孩子的品行涵养、兴趣爱好,为其一生的幸福从长计议?以“丈母娘”的视角来教学,或许还能减少仅以成绩论英雄,把很多学生培养成为“失败者”的不良后果,或许也能走出苦心培养产生的应试“高徒”,在回归生活后却缺乏情趣、连自己都无法悦纳的悖论。

当然,“丈母娘”视角看教育的作用,也不能盲目夸大。试想,当下教育的功利化追求,使得一些爹娘在教育亲生子女时都异化为“狼爸”、“虎妈”、“怪兽”,用棍棒把孩子打进北大……如果教师无法避免同样的功利化追求,那么即便持“丈母娘”的视角,也会让教育行为更焦虑。 李爱铭

打车难是改革难的缩影

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1-2012)》认为,打车难的确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较为普遍的问题。蓝皮书指出:53.77%的人打出租车需要10分钟以上,只有占总体比例11.68%的人等出租车的时间在5分钟以内。

“每周限行那天,在刺骨的寒风中带着孩子在小区门口打车让人绝望。尤其是有关部门抓黑车的日子。”一位北京妈妈的抱怨可能比蓝皮书中的数字更感性。

大城市为什么打车难?应该如何解决?蓝皮书以及媒体、专家进行过大量分析、报道。然而可怕的是,长期以来,面对这种普遍的打车难,面对民生问题的强烈呼声,有关部门的麻木和安于现状竟然已经成为惯性。

当然,修修补补的措施还是有的。例如,提高对拒载的行政处罚等。但是在记者看来,大城市打车难表象背后骨子里是改革难,是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政府部门能不能拿出更大的勇气深化改革,使出租车准入、管理、运行机制更贴合市场需求,真正体现出“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租车领域的改革属于大城市治堵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城市公交优先的战略背景下,出租车是公交运力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轨道交通和公交巴士拥挤不堪的大城市,出租车出行对老人、孩子、病患以及希望能体面出行的群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要求管理部门及时调整管理思路,向更及时服务大众的职能转变。

举例来说,打车有多难,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消费者。如果一个大城市打车难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管理部门应当考虑采取听证会的方式,恰当选取各方代表听取民意,并及时对供需作出微调。当然,在微调时,要兼顾消费者需求和出租车司机的利益。除此之外,打车的市场需求还与天气状况等密切相关,需要建立一套灵活的供需调整机制。固守当前的出租车准入的垄断格局,认为目前的出租车数量不能变,无疑是一种滞后、保守、僵化的思路,会使行政准入成为阻碍市场调节力量的门槛。

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者还应从舒适的公车车里走出来,在寒冷的天气中亲自到街头体验一下打车难、挤公交难、乘地铁难。感受不脱离群众,决策才能有的放矢。

平心而论,与收入分配改革等更高层级的改革难题对比,出租车改革不是最难的。但是怕就怕出租车等改革上的这种久拖不治,会对改革信心制造极大的负能量,让百姓在寒风里的等待中心更凉。 南辰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释放哪些信号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收入倍增”进程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

农民收入涨得快,一靠人努力,二靠天帮忙,三靠好政策。因此,只有不断改革完善和创新“三农”政策,才能为完成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添加不竭动力。

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建设高标准农田增加单产……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农民收入增速不断加快。据统计,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31个省份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全部高于当地GDP增速,并有29省份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

但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连年上涨,农民收入增长部分被打折了折扣。近年来,虽然粮价节节走高,但有的农民反映,种粮越多,赚钱越薄,还不如出去打工划算。猪肉、蔬菜价格总玩“过山车”,却是“中间乐,两头苦”,许多农民没有因此受益。让种粮不吃亏、养猪跳出“猪周期”,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支农政策。

农业是高风险的脆弱产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仍需一以贯之,公共财政要进一步向农村倾斜。例如,继续增加农业补贴的种类与数量,加强科技和农田水利投入,缩短流通环节减免流通费用。只有让农业有赚头、农民有奔头,实现收入倍增才有盼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潜力和希望也在农村。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经济社会体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明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仍然是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三农”搞得越好,农民收入涨得快,则国泰民安基石稳固。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正是从提高农民收入的长远战略考量发出的重要信号。各级政府应用改革的眼光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用创新的精神推进“三农”工作,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部署抓实抓好。 徐扬

为期两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2日在京闭幕。会议系统总结2012年和过去10年农业农村发展成就,深刻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重点研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全面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12月23日《人民日报》)

土地流转关键是 建立市场定价机制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决定,首次赋予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获取流转收益的权利。

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以来,提高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进一步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且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快了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差距。但与此同时,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面对强势的基层政府、农业企业等经济组织,往往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导致农民被限制、被强制流转土地的事件时有发生。而且,在强行干预农民流转土地的过程中,“村官卖地”、“乡官卖地”等腐败现象也屡有发生。当此语境,中央要求不能限制、强制农民流转土地,可谓有的放矢,切中时弊。

201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披露了一些地方存在强行推行土地流转的现象:有些地方把政策引导变为行政干预,强制农民流转土地;部分基层组织随意变更甚至撤销农户的承包合同,集中土地搞对外招商,强迫承包户集中流转。对此笔者以为,一些地方之所以热衷于强行干预农民的土地流转,根本原因在于某些基层政府、官员从中有利可图:一者,土地流入的对象要么是当地的承包大户,要么是地方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规模化生产显然更有利于干部出政绩;二者,一些地方强行干预农民土地流转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则是某些基层政府、官员以“政府定价”代替农民行使了定价权和议价权,从土地流入者那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三者,一些地方的不少“承包大户”,实际上就是村官、乡官或其“代言人”,“裁判兼运动员”,公正性自然大打折扣。

以政府定价代替农民定价、议价的结果,就是土地流转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市场价格,以至于《人民日报》的记者感叹“土地流出一方的农民,与土地流入一方的承包大户之间,收入差距之大令人不忍。”为此,要想防止限制、强制等强行干预农民流转土地的行为,关键是建立农村流转土地的市场定价机制,还农民定价权和议价权。

行文至此,笔者还想说几句“题外话”:土地流转只是流转了农民承包地的经营权而非承包权,尚且不能强行干预,那么一些地方补偿不合理、手续不完备、程序不正当的、完全剥夺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征地行为是否也该及时刹车呢? 瞿玉杰



吴之如 文/画

年终总结要认真找差距

岁末年终,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在进行工作总结。盘点过去一年,部署新的一年,这很有必要。

总结贵在实事求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各项工作有新进展、新成就,这是基本面。功劳归于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辛勤劳动,来之不易。肯定成绩、表彰先进,既是一种尊重和鼓励,更能够鼓舞士气、激励奋进。总结得好不好,取决于是不是真实可信;成绩大不大,自有口碑。总之,年终总结应与实际工作相符合。

年终总结要看到成绩,从中提炼经验;更要发现不足乃至失误,从中吸取教训,这是把工作做得更好的重要基础。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分析形势、谋划未来,要“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掌握主动权。这也是我们做好年

终总结的基本遵循。

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总结,找到问题和不足,明确努力方向。以往一些单位的年终总结,一个突出问题是“用力不均”,说成绩浓墨重彩,说问题蜻蜓点水。有的单位部门,眼里只有亮点而没有痛点,甚至浮夸虚报,搞成庸俗的成就喜报。这样的总结,言之无物,对工作没有帮助,反而让群众反感。

总结一味评功摆好,或是个人有私心,生怕说点问题伤了面子、影响“帽子”;或是认识上有误区,总觉得一说问题和不足,就会影响士气、打击信心;或是因为工作上热衷弄虚作假,做虚功,以为“工作是否出彩,关键就看总结”。总结回避问题,还不只是文风问题,更是作风不务实、工作不扎实的反映。“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在当前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矛盾尖锐突出,如果看见不足不愿提,发现缺点不愿改,问题被埋在那里,就会贻误消除弊端的时机,使问题难上加难、风险越积越多。

审时度势,决策乃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要求领导干部凡事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工作主动。总结中关注问题、思考问题,并不是找别扭、煞风景,而是事业发展的真需要、转变作风的必修课。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增强忧患意识,要看到提出问题才能及时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才能切实提振信心,也才能在来年改进工作,更进一步。

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今年做总结时,多一些空洞无物的说辞,多一些直面问题的勇气,按照中央作风要求,拿出一份求真务实、令人信服的好总结。 人文

从官员“抛售”中 透视网络反腐的不可或缺

近日,多地出现政府机构人员放盘出售的现象,有公职人员甚至一次性抛售8套房产。这个现象不禁令人兴奋,除认为是网络反腐起到了良好的倒逼作用之外,更有人乐观估计官员将“灰色收入”之一的房产大量抛售极有可能导致房价下降。

官员“抛售”潮这一现象的出现或可从多层去分析,但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便是网络反腐所形成的有效倒逼。

盘点近年被民众掀下马的官员,有绝大部分是因为民众对网络这一技术手段的运用而达成的,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迟迟无法问世的前提下,网络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制度补充,并达到了制度的效果。消极、滞后的体制内监督由于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很难对官员的贪腐行为明察秋毫,也必会导致在反腐层面上力有不逮,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民众对贪腐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同时在技术的辅助之下起而行之,迫使官方与之对话,甚至要求对这种以技术力量为先导的民间反腐模式做出行动回

应,从而拉开了新型的反腐战争。从一开始以资讯获取和娱乐为主,到如今有意识地运用这股力量进行反腐,民众对网络的认知和运用完成了质的飞跃。“艳照门”、“表哥”、“房叔”,这些代表符号的出现,几乎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民间在与贪腐官员博弈的过程中,找到了最有利于自己的“战场”,尽管有人攻击这个“战场”不乏民粹的狂欢特色,但在制度短腿的映衬之下,它仍然不失为一种鞭策与敦促,驱使制度尽快跟上。

严格说起来,网络反腐的性质可以归属于特殊的社会运动。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并非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但它的目的是清晰和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它完全符合社会运动的属性。我们从若干网络反腐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民众的诉求,且在这种诉求下所形成的行为选择并非理性全失,这从大量被爆料后经查属实的腐败案件结果中可以看出。

任何与正义相悖的经济、公职行为,不可避免地都会陷入被讨伐的局

面。19世纪下半叶美国曾掀起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在没有现代网络技术支撑的当时,走在前沿的是美国的媒体。目前中国的网络反腐与曾经的“扒粪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均是基于社会诉求而自发形成的与强势方的对抗,同时在这种对抗之下也都相应取得了成效,“扒粪运动”中一些参议员席位的丧失,网络反腐下“表哥”、“房叔”的依法,都代表这种社会运动下所产生的威慑力。

官员近段时间大量抛售房产,未必会导致房价走低,房地产开发税费过高、土地出让金成本越来越高等因素的存在,或许使这种靠官员抛售来“救市”的言论显得有点异想天开,但官员抛售现象的出现,无疑代表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他们已经感受到了网络反腐带来的危险性,故而急于擦干净自己的屁股,避免身陷危机。在这种不乏喜剧效果的现象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正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且这种力量与影响,任何人都无法将之阻挡在时代之外。 张英

“村官被选聘到村里,就是在村里奉献,做好农村工作。可是南乐组织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大部分大学生村官不在乡村上班,都是交点钱,全年在社会上干活儿。快管管吧!”这封措辞严厉的投诉信从濮阳市委书记信箱被转到市委组织部,不到两周,组织部就通过随机抽查的办法,对100名大学生村官进行调查。而抽查结果令人咋舌。(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大学生村官 “不在村”的思考

很明显,投诉信所反映的事情确实存在。早在去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徐双敏教授曾发布《湖北省大学生“村官”现状调研报告》,称六成大学生“村官”不在村。报告分析,“村官不在村”,主要的原因是被上级抽调,到乡镇、县干活去了。而这次濮阳的情况,也属于“村官不在村”,但原因却不同,是村官一边挂名职务,一边到外去兼职干活了。

舆论批评大学生村官“不敬业”,既然做村官,就应该心系农村,踏实在农村工作,怎能一边有着村官的身份,享有村官的好处——按照有关政策,大学生村官在日后考研和考公务员(考公务员定向招录)都有一定的优惠——一边却不务正业?大学生村官这样做当然不妥,可是他们之所以能这样轻松地到社会上干活,一定程度上与村官无事可干有关。

我国大学生村官工程的初衷,是用大学生的才能去建设新农村,同时也给大学生基层锻炼的机会。中央为之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可是,具体到地方,却少有完善的对接机制,有的地方的乡村并没有考虑怎样利用好这样一批学生,只是出于完成任务接收这批学生,不对上岗学生进行培训,没有使用的规划,没有带教的老手,没有明确的工作安排,也没有管理的规章,就由学生自我发挥。在地方看来,这些学生也没有长期扎根农村的打算,不过是在农村来谋一个“身份”,挣一段经历。

如此一来,原本想到农村大干一场的大学生村官,很快便变得心凉,很多事想做也不知从何做起,于是觉得农村无所事事,就更不用说一些本来就是冲着村官考研,考公务员优惠政策而去应聘的大学生村官了。这哪里是大学生村官服务农村建设、发展,分明是给这些大学生村官带薪复习、带薪兼职的机会。这是值得大学生村官工程推进机构反思的。首先,大学生村官不是“面子工程”,需要地方结合实际人才需求聘用村官,而不是追求数据。其次,不能一味用政策优惠去吸引大学毕业生,而应该用村官职业的发展空间吸引人才。

地方需要大学生人才,但最适合的方式,应是地方直接与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对于选择到农村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政府再给予适当的奖励、补贴。这样,地方会有使用、管理大学生村官的长远规划,丰富村官工作的内涵,以此吸引大学毕业生;大学生也会从村官职业本身来规划职业选择和人生发展。这样的村官工程,才能对改变农村发展状况起到实际作用。 蒋理